

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

高王凌

“康乾盛世”是清人对康熙至乾隆时期历史的一个美誉，其说由来已久。最近10年来，5次清史年会中两次都以“康乾盛世”为题，这或许表示出18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和特出价值；也许，还显示出对“正史”研究的再次强调？

“康乾盛世”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一样，同属于中国历史上最受称道的几个时代，对中国文化传统曾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它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正面观察一个传统政府都可能做些什么，获得哪些成就；这与从其他时期或“反面观察”，会有很大的区别。我想，也许这就是人们强调“文”、“景”、“贞观”这些帝号和年号的含义罢。可是在现代不少史家的眼中，这些几乎变成了“死历史”，似乎也与今天相去不知有多么遥远。借此机会，我想就“康乾盛世”提出一些问题，如它的起迄年代应订在何时？它的成就及其价值何在？传统政府及其政策在其中起到何等作用？以供大家讨论。

“康乾盛世”究竟应从何时算起，这似乎是一个被史家忽略了的问题。认真想来，它似乎不能包括康熙初年。当时清人虽已基本消灭了明朝的残余势力，但不久就发生了三藩之乱；直到康熙20年代才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结束了朝代鼎革之际长达40年之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明代末年以来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天灾和气温下降时期也终于过去。因此，康熙20年左右便成为清初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但是，如果说“盛世”，则还有若干问题值得考虑。例如，从顺治末到康熙初，因为白银进口中止而发生了货币短缺、物价全盘跌落和经济萧条（参见岸本美绪的研究），这一局面直到康熙30年代中期以后才告结束；也就是唐甄所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天子宽仁而恤民，兵革偃息，国家无事”，“而困穷若此”（《潜书·存言》）。再者，清初以来的“招徕开垦”，由于战争的结束正得以全面地开展。所以这一时期仍应算作新王朝建立初始多会经历的“恢复时期”；而所谓“康乾盛世”大约应从其后一个时期，即康熙40年代（公元1700年代）以后算起，简言之，它应是指中国18世纪的一段历史。

清圣祖（康熙）于听政之始，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三藩平定以后，即开始沿运河南巡。当时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鼓励垦荒、修河治水、蠲租减赋。这些可以称之为“恢复政策”或“垦荒政策”，也是历代王朝“恢复时期”的向行做法，清代的努力自然也非常成功，并备受好评。

但是，就在康熙40年代，这些政策开始有了重大变化，并从此拉开了清史新的一幕。它使我们可以回答如下的问题：传统政府在“招徕垦荒”或“恢复时期”之后，对于经济的发展，还有无政策可言？如果说有，它是怎样的？或者我们可以倒过来问，经济发展及其政策问题，是否在19世纪中叶或20世纪以后才在中国出现？这中间的历史难道只是一种“断裂”？

事实上，在圣祖南巡的过程中、于康熙40年代即发现了人口问题，并指出要“预筹安养之策”（参见拙作“18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经济对策”，1982年第1届清史年会论文）。于是，在它的带动下，从1700—1750年代，即跨越康熙末、雍正朝、到乾隆初的大约50年间，成为清代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清代的几乎所有“德政”，如“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地丁合一”、“火耗归公”、“轻赋”和“永不加赋”的原则，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或确立的。在这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无疑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顺便指出，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以为清代人口问题是乾隆末年被洪亮吉发现的。这与圣祖的发现相差有90多年。但是，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史实上或时间上的不同？它是否会忽视了面对着日益加重的人口压力，清人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并把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被动应付？还有，洪氏与圣祖的思想究竟有多大差别？他是否应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与从发展经济入手不同的控制人口的观点，不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在中国出现（见汪士铎的私人日记）？这些显然还关系到，应如何认识中国的解决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如何认识传统的中国式的反应方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等问题。

简言之，从1700年代清人提出人口问题及其对策以来，这种对人口压力的认识直接带动了许多新政策的提出，二者相伴相影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可以说是圣祖南巡的最大收获，即寻找到和提供了一个目标或口号，为以后政府的长期努力规制出鲜明的色彩。

具体说来，18世纪上叶清代政策中最值得令人重视的就是经济发展政策。但它与其他许多新政策一样，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同时，旧的政策也不是一下就放弃或改变了的，这中间有着许多的断续和交错。不过，通观这整个时期，便不难发现许多旧的政策已为新政策取代，政府政策的重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垦荒政策和蠲免政策或已放弃、或已不占重要地位，随着东南水利的初步告成，政府的关心也由运河一线的“基本经济区”转向了内地广大的欠发展地区。

关于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可以分做几个层次，首先是农业方面，它或可称之为“劝农策”。这一政策的主导思想，就是在耕地很少或不再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水平，以发展经济。它的主要内容，即是“不独以农事（按指大田谷物生产）为先务”，而“兼修”其他各业，全面发展生产和展宽经营方向（乾隆7年6月甲寅谕）。即提倡在粮食生产之外，着重发展他种经济作物种植，在土地经营之外，谋求山林、水泽、畜牧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尽地利非必尽于稼穡”（《皇朝经世文编》），这就是对当时农业发展方向的扼要表达。

这使我们还要进一步回答若干问题。首先，清代中国传统经济，是不是“自给自足”的？如果是的话，将如何解释清代遍及各地的小市集，地方上大量的商品交易，高水平的货币经济关系，以至省区间以粮食和棉布为首的大宗贸易？反之，如果把它称为一种“市场经济”，还应对这概念加以怎样的界定和说明？清政府的劝农策，殊少洪武式的强迫命令，而主要是提供指导和某些条件，由农民去自主选择。如强调“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小之，可以充口腹、供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做得一件即有一件之利”（陈宏谋《耕讲堂杂錄》、阐昌言《农事说》），这种对于商品生产的提倡与上述说法有无矛盾？我们又当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这一问题，显然不仅涉及到对于中国

传统经济形态和传统政策思想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于“农民行为”的正确理解。

再者，对于清代的劝农策，很容易做出“副业一补助”式的理解，即认为它不过于原有经营外稍事补充，这种看法正确么？我们应如何认识粮食等所谓“主业”以外经营的发展潜力，以及“小块地土”的重大作用？又应如何评价当时一些官绅（如杨屾等人）所具有的提倡规模经济和发展优势生产的思想？

事实上，18世纪清政府的劝农策，从一开始就是自觉地针对人口增长而提出的；其时人口增长之快及其后增加幅度之大，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因此，它所寻求的决不仅是在经济上打开一点小的“出路”、做些“副业”补充而已，而是较之有更高一步的大幅度发展。

因此，对清代经济发展政策决不应予以低估。它的合理性和遗传作用，在200多年后的今天正得到更好的显现。谁能说它的价值仅以“传统”二字即可概括？这也使我们需要重新评价清代思想史及有关问题；而就清代的发展问题而言，它究竟是在思想认识的不足之上，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现在，我们再来观察清代相应的经济发展及有关问题。

当圣祖最初发现人口问题之时，中国人丁总数不过2千余万，在圣祖心里这统计是很靠不住的。但到乾隆初年重建人口统计制度之后，全国人口数字便一跃而为1亿4千余万，并终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增加到4亿数千万之众。与明代相比，清代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净增数约为3亿。这成为现代以前中国幅度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相应的，清代经济的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呢？

如果说明代中国的经济重心较偏于东南诸省，清初以来，急剧增加中的人口便大量涌向中南、西南、以及东北、台湾等地，使这些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这也许可以称为“全域性的开发”。其主要表现即是，中国耕地在清代增加了一倍左右（不过所有这类数字都是非常不可靠的）；美洲作物等优良品种、精耕细作的高水平技术，也都得到广泛传布和普遍推广。这些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参见何炳棣、珀金斯和王业键的研究）。

但是，上述几点的相乘结果，可能并不足以解释清代的经济成长，和不足以反映这一成长的主要特色。为此，我们需要一番新的观察。

比如，在近几百年的中国经济史中，棉业是一个相对新起的行业。经过早期的散漫而广泛的传播阶段之后，棉花就不断地向优势地区转移，到明末，今日中国的三大优势棉区即已具备雏形（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并终于发展为仅次于粮食的一个大而集中的种植项目。棉作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就这样带动了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棉业产品和粮食，成为省区之间最大的贸易物品。这种省际比较优势互相交换的经济格局，到18世纪终于形成。它能够在不增加耕地、肥料及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赖“布局”的调整，即提高社会的总体收入。我认为，这就是全域性的开发之外，清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重要成就，——应该指出，这一格局到今天仍没有“过时”，并与现代发展有着正面的接续关系。因此，对它似乎评价多高都不过份。

中国文明在数千年里始终维持了农业的不断发展，这是怎么做到的？又如何在18世纪末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个具有超时代性和世界意义的大问题。就此而论，清代的成就主要并不在土地的增垦，而在于生产的高层次发展，如农业经营范围的全面拓宽，商品性生产的普遍发展和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发挥等等。再加上数亿人口生活所需

的粮食及工业品的提供，可以看到，清代经济曾有一个多大的总体扩展。在这中间，如果说有什么政策因素，当首先归因于清代经济发展政策，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招徕垦荒”。可以说，清代有关政策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一致的，至少，也对后者有相当的助益。

当然，在这中间，不同的省份获得了不同的发展结果，而与其本来地位未必有多大关联。这也许会使人们想到，为什么在相同的劝农策下，有些省区无论如何也难于形成新的优势？这种不同应如何解释？问题到底在哪里？

过去，人们主要是把国力强盛、财政充裕、和平、统一等作为“盛世”的标志。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也在近年的研究中重新受到正视。但是，对于处于发展中的当代社会来说，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政策、以及下述政府作为等问题就自然具有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地方事务的干预和控制权力，是愈来愈削弱和下降了。这种论点是否也需修正？20世纪中国政府权力的全面强化和扩张，难道是一件十分突兀之事？在这“大轮迴”的运转之中，是否应有若干不寻常的脉搏跳动？这里，18世纪的有关史实显然是被人们忽略了。

18世纪上叶，清政府全力在各省各地推行其劝农策，这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钱粮”和“命盜”，一向是地方官员的传统职守。在新的形势下，他们被要求扩大职责，关心“百姓稼穡”。在省级，要设立农官，以农务考核州县；督抚则需将其悉心条对。州县一级，官员要适当久任，以期实效；平日则巡历乡村，亲自劝导。州县以下，须择出乡农数人，协助州县；或令乡长、乡约，配以“廪餧”“奖掖”，代为化导；村长则查验农功，注册送县。乾隆初年经过讨论之后，虽未同意大规模增设官员，但现有职权却已大为扩张。

加强行政措施本为劝农。当时在各级政府涌现了一大批能员、循吏，他们依靠地方财政、基层组织的某些支持，为新生产项目的发现和推广，提供信息、引进原料、传导生产方法、提供部分资金、保障初期销路；一时俨然成为一个大的生产组织者，起到当日其他社会组织难以起到的作用。所有这些，在乾隆初年都达到了一个高潮。

高宗（乾隆）初政，继乃祖乃父之后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爱民”、“养民”、“足民”，“不使一夫失所”；同时要政府扮演更为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如曾考虑土地制度问题，议行井田，讨论限田、均田；虽因“名虽正而难行”，未予实施，却再度考虑了减轻田租等问题，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之广。

不过，乾隆初年政府的最主要努力，却不是这些，而是在粮政方面；高宗也正是想通过这点，来实现他“养而后教”的宏大目标。于是，政府就粮政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政令，如充实常平仓储、复开本色捐监，意图使官仓储备从1千余万石增加到6千万石；又加强社仓、义仓及民家自储；议行田赋征实、敞开收购余粮；复令破格平粜、赈恤、扩大仓粮使用范围及数量；同时，加强粮食生产；禁酒、禁烟，禁止遏籴，禁屯积，开米禁、免米税；并为此建立了人口统计制度及健全粮价呈报制度。

上述措施的主要目标，就是企图更多或主要地依赖政府系统的能力，一举解决赈灾、济贫乃至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它把康熙以来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也使政府干预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常平仓储的数量，在几年时间里就有了成倍的增加，而且应注意到，在每年大量破格赈粜的情况下，实际补充额要远远大于年终数字的显示。据估计，其数额接近于长江流域的省

际交易数量。在随即到来的18世纪或说是清代的最大一次灾害、即乾隆7、8年的大灾中，官仓储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使当时的“西方”政府相形见绌。因此，人们有道理给予它很高的正面评价（参见王国宾、濮德培和维尔的研究）。

但是，粮政的加强也引出了其他的问题，并终因粮价的持续上涨导致了乾隆13年的大讨论。这次由皇帝发起、督抚复奏的大讨论，触及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如对粮价上涨原因的分析，涉及到人口因素和货币问题。当时虽未对此做更多的探讨，而把问题归结到人为因素“采买过多”之上；但粮政问题的实质，究竟是在哪里？大量的采买是否打破了供需平衡或导致了民食不足？或者，这归据到底乃是一个政府角色的选择问题？即政府是应全包大揽、一切统办，还是适当干涉，而让社会、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高宗终于也认识到，“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转多杆格”（乾隆9年3月辛丑谕，13年5月乙酉谕），——大概这就是这次粮政事件的主要教益罢。

粮食问题是那样的重要，因此粮政讨论还涉及到流通、生产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如加强生产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政府如何才能促进粮产的增加？它又如何判断有关的供需形势？对粮产的特殊强调与“劝农策”之间的矛盾，又应当如何处理？……

经过乾隆13年的讨论，粮政事件终于收束。仓储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接近于当时实储数），仓粮的大进大出也停止了。但是，这一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些，它构成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一次重要“脉动”，开启着其后历史的发展、转变；它所涉及的问题，也不是当日一时的，而是在近五百年历史中贯穿始终的。在许多方面，人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是历史的一个继续。清人的作为，也许正可称为“一个未完结的尝试”（拙作，见《九州学刊》2卷3期）。

在上面的政策讨论中，我们把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传统中国无疑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但传统工业在其中毕竟占有相当的地位。其中尤以纺织、加工、制造、营建、矿冶为著，并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因此，它虽与现代机器工业有很大不同，却通属于“工业”范围。就此而论，清政府在劝农策中曾对农产品加工和农家手工纺织业与其他诸种经营一起加以提倡，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到乾隆初年，一向被严厉管制、只在某些省区、个别部门允许的矿冶，也终于开禁了（参见韦庆远和鲁素的研究）。并且将官办改为民营，将只许贫民开挖改为招商开采，也不复限制雇工人数及其规模。矿冶开禁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有所需要（如铜），另一方面也为开辟生产途径。这样，矿政就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努力连在一起，成为当时“养民”、“教民”的重大措施。

如同农业方面一样，清代传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它依靠一种分散而广泛的发展方式，提供着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工业需求；同时，在江南也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产值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工业区”。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清代已超出基本食用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经济阶梯，即经济全面发展，并亟亟于工业的增长中谋求出路？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工业化”要求，便不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为外国人所带来，更不是20世纪才有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历史而出现的切实要求，至迟在18世纪它已出现。

不过就在这一方面，传统政策和传统思想受到了最多的批评，例如它的“工业”概念、

“守农”思想乃至其经济理想等等。如若从现代经济观点来看，更不免会产生“处处不合”之感。但是，传统中国连同世界各农业文明的经济思想，尽管颇有不足和缺乏眼光之处，它们本身是否就这样不合道理？我们究竟应如何认识它们、及其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再者，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后叶，在那之前，还没有一国政府拥有此类思想；在这点上，我们能否苛责18世纪的中国？

对待这一类的问题，不少人总爱以“中国为何未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来进行思考。但是，这一提问本身正确么？它是否把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发生这类问题想像得太简单了？它又对中国实际历史的正面观察和古今贯通有无帮助？我们可否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例如，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达到2亿，到清代才增加到4亿以上；耕地也有近一半的“余地”是在清代得以开垦；各种高水平技术的推广以及新经济格局的奠定，在以前也从未能够；在全域性开发和高水平发展的同时，经济达到或接近一种以工业制成品和非生活必需品为先导的高梯次，——这些史实难道不是显现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有条理的、有次序、有步骤、由低向高的合理的过程？而且到19世纪中叶以后，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道路又多么曲折，它已与一个新的发展接续起来。难道这不正是中国的实际历史？我们应否仅因中国现代转化中的一些问题（有些也不属于历史、文化和传统问题），便只对它做反面的观察？

在一个王朝的早期或恢复时期，传统政府颇不乏前车之鉴，也多不难取得成功。但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问题便复杂起来。政府既难于选择其努力的目标，也不易适当运用它的权力。但是，清代的努力，无疑已远远超越了以前各代；就18世纪的政府政策来说，我们也很难说它一定错在了哪里，或能为之找出一个替代方案。因此，当粮政事件结束之后，高宗怀着一股若有所憾的心情，开始南巡以进行新的目标探索时，他的“无功而返”是可以想见的了。这，也许正是康、乾南巡的最大不同之处。

最后，对于“康乾盛世”的“下限”，可能多数的看法会把它定在乾隆后叶，或于18、19世纪之交为中国史划一界限（参见《剑桥中国史》）。这样需要解释的就是，在清代与“康乾盛世”同时为何还并存着“乾嘉盛世”的说法？为什么有一些地方的史料表明，其发展的最盛时期，不在乾隆、而在嘉庆？这也涉及到18世纪末白莲教大起义的原因、当时中国经济形势及其问题的症结、以及传统经济的“极限”等问题。在这些以及本文提到的所有方面，恐怕都是提出的问题要比解决的多。但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步，不正是要提出问题？